

玉林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工作优秀理念和科学思维探索成果系列丛书

LISHIXUE SHIFANSHENG
SHIJIAN SHULUN

历史学师范生 实践述论

主编 ◎ 曾凡贞 朱凤林

玉林师范学院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都 •

玉林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工作优秀理念和
科学思维探索成果系列丛书

编 委 会

总 主 编 王卓华

副总主编 蒋丽萍 唐世纲 崔海波 赖兴琿

编	委	王卓华	蒋丽萍	唐世纲	崔海波
		赖兴琿	刘小云	袁名泽	曾凡贞
		高红艳	许世坚	朱波涌	李远华
		蒋 宁	郑容森	杨一笔	向云根
		陆小玲	蒋 慧	陈 渊	梁志清

总 序

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实践活动。它随人类的产生而出现，并随人类社会的变迁而发展。学校教育是教育发展 to 一定阶段的产物，既是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对大量人才渴求的必然要求，又是教育自身制度化、世俗化、系统化和专业化的结果。教师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一种特殊类型，是现代教育持续发展的工作母机。师范院校是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构成，更是承载教师教育使命的主体机构。因此，“寄居”于师范院校的教师教育工作者，总结教师教育的发展经验，探寻教师教育的发展趋势，揭示教师教育的发展规律，既是一种责任担当，更是一项光荣使命。

作为我国师范院校的一员，玉林师范学院的办学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1945 年创建的广西省立鬱林师范学校，师道传承七十余载，源远流长。以师范立校，以师范兴校。学校在升格为本科院校之前，因“为基础教育培养合格师资，方向明确，成绩显著”，成为全国 26 所受到国家教委表彰的师范专科院校之一，也是广西唯一获此殊荣的师范专科院校。2000 年，玉林师范学院升格为本科院校以来，面对市场经济的不断冲击，仍然始终坚守师道传承，对自身进行准确定位：把学校办成以培养义务教育阶段的师资为主要目标，达到较高水平的教学型地方本科师范院校。2012 年 6 月，学校召开第三次党代会，在本次会议上确定了“师范性、地方性、应用性”的发展目标，以“师范性”作为学校的办学特色，“地方性”作为学校的办学定位，“应用性”作为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2015 年，在综合改革和转型发展的背景下，学校重新调整了办学定位的表述，即“地方性、应用型、师范性”。尽管如此，“师范性”仍然是学校发展的重要坚守点，是学校办学特色和优势所在。目前，学校有师范类专业 29 个，覆盖了学前、小学、初中等基础教育以及职业教育等各个阶段的教师教育；在校师范生的规模和比例在全区高校中位居前列，在校生 17 418 人，其中师范生 10 733 人，占有全部在校生的 61%。

进入 21 世纪以来，学校解放思想，抢抓发展机遇，开拓创新，认真贯彻落实“规模发展与内涵提升并重、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并重、特色培育与整体质量提高并重、自主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并重”的发展思路，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着力整合各类资源，全面实施人才兴校、人才强校工程，启动综合改革，推动转型发展，优化学科结

构，努力探索培养义务教育阶段基础教育师资的新模式，大力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应用型专业，坚持“地方性、应用型、师范性”的办学定位，朝着“努力建成国内知名、区内领先、以教师教育为特色的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目标奋进。

乘着综合改革和转型发展的春风，学校积极探索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开设“挂榜班”“卓越班”，加强卓越人才培养，“挂榜班”“卓越班”学生成绩优异；开展实践教学改革，推进顶岗实习、混编实习等模式，提高专业实习效果；坚持以赛促练，以练促学，定期举办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板书大赛等，组织学生参加自治区级、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比赛并屡创佳绩。与此同时，学校各师范专业的教师教育工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围绕自己的学科专业领域，选定相关研究主题，积极开展研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这套丛书就是学校教师教育工作者相关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它既彰显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学校教师教育发展的基本轨迹，还表达了教师教育工作者的理想与期望。当然，由于时间仓促、作者水平有限，本丛书肯定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恳请各位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编委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

目 录

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	1
20 世纪 30 ~ 40 年代的广西农事改良试验	13
桂中甘王信仰与地方社会的整合与冲突	26
顺世而生又异世而立：陈柱《学术世界》与章太炎《制言》比较研究	39
周春《西夏书》探析——兼谈周春的史学成就	54
论近代梧州经纪业与航运交通的相互作用	69
玉林天地会研究	78
王灵农场发展史研究（1978—2010）	88
明代北海珠业的官方表达与民间故事	103
绿珠·绿珠井·绿珠圣女——广西博白女性绿珠历史形象研究	112

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

政史学院历史学 2011 级 陈丽华

指导教师 陈耀华

摘要：1925 年，清华设立国学研究院，以“研究高深学问，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1926 年，王力考取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始了师从四大导师的求学岁月。在这一年的学习生活里，王力不仅懂得了治学的一般方法，还与四大导师建立了真挚的师生情谊。其中，赵元任对他的影响最大。赵元任不仅在学术上对王力进行严格的训练，还建议他出国留学，这为他从诸子学研究转向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契机，最终使他将语言学研究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可以说，在清华学习的一年，对王力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关键词：王力，传统教育，清华国学研究院，求学

引 言

王力（1900—1986 年），字了一，广西博白人，语言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1932 年，王力从法国巴黎留学归来之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广西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著有《古代汉语》《老子研究》《中国古文法》《中国音韵学》《中国语文概论》等四十多部专著，发表论文近两百篇。他为语言学的研究和语言学人才的培养，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为我国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目前学界对王力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他对中国近代语言学的贡献上，出版的专著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家人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和《中国社会科学家人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年）。这两本书简要地概括了他的主要生平事迹，以及他作为语言学家的主要成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王力文集》（二十卷）。该文集整理了王力在语言学方面的主要成就。而对于王力个人的生平事迹，主要有《广西日报》原资深编辑张谷和王力的大女儿王缉国所写的《王力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该书用翔实的资料、简练而流畅的文笔、通俗平实而又情深意切的语言记录了王力先生的一生。

研究王力学术及思想的论文也不断涌现，这些论文涉及的领域很多，但具体化的研究论文数量尚少。论文主要着眼于对王力语言学成就的解析与评价，主要有：林玉山的《论王力的语法思想》（《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第 6 期），论述了王力语法思想的主要内

容、语法思想的发展过程以及对中国语法思想史的重要影响；金晓艳、彭爽的《王力汉语语法研究概观》（《宁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概说了王力在语法思想上的主要成就；蒋绍愚的《王力先生的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作者结合自己个人经历，对王力在词汇学上的成就做了分析与概说；梁永斌的《王力古音学研究》（西北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从王力先生古声学、古韵学、古调学三个方面的研究入手，对王力先生的古音学说做了客观的梳理和研究。

尽管关于王力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对他如何成长，特别是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求学的那段经历却研究甚少。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习历程中，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本文拟就此加以探索，以期揭示这段求学经历对他学术成长的重要性。

一、中国传统教育润泽下的王力

被誉为中国现代著名语言学家的王力，其成长之路并非一蹴而就。王力自幼家境贫寒，求学之路历尽艰辛，6岁入私塾，11岁就读于博白县高等小学堂，但14岁便失学了。此后，王力便开始了自己十年的自学岁月。直到1924年，他才考入上海私立南方大学国学专修班。在进入上海私立南方大学以前，王力是在中国传统教育润泽下成长的，这为他以后的学术道路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一）王力与传统蒙学教育

蒙学是指对儿童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教学活动。古代蒙学的教育对象在年龄上并没有特别严格的限制，小至六七岁，大到10多岁，只要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教育，都可以进入私塾接受蒙学教育。总的来说，蒙学教育是相对于近代新教育而言的一种旧教育，是对中国古代私塾、社学、义学教育的总称，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蒙学教育中的学生

蒙学教育的形式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教育；另一种便是正规的古代教育机构——私塾。1900年，王力出生于广西博白县岐山坡，其家族在当地算得上是书香门第，他的曾祖父文田公是清朝的贡生，文田公的儿子方洲和王力的父亲贞伦都在15岁就中了秀才。家庭的读书科考传统使得王力的启蒙教育早就得到了开启。根据他自己的回忆，小时候父亲就常以文田公留下的手抄唐诗本为教材，手把手地教他临池学书，使他在习字的同时又学会了許多唐诗。因此，他五六岁时就能吟诵李白的《静夜思》。

这种家庭教育使王力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王力7岁进入私塾读书时，对《三字经》《神童诗》等教材都能过目成诵，只字不漏；第二，王力在县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受陶伯明、冯彰全两位老师的影响，背诵了大量古文名篇，还阅读了大量的章回体小说，其勤学好问的程度可见一斑。

2. 蒙学教育中的老师

1914年，王力高等小学堂毕业后，由于家庭原因，无法升入初中继续学习。自此以后，王力便整整失学了十年，这十年也是王力自学的十年。在这十年里，王力经历了许

多事。

其一，自办私塾。1917年对于王力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王力已为人夫、为人父，他必须挑起家庭的重担。沉重的责任与现实的压力使王力不得不效法他人，利用所学自办私塾。从这一刻开始，昔日的学生王力成了一名教师。对于如何成为一名教师，对于没有学过现代教学法的王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他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效仿以前他接受启蒙教育时老师的教法；另一个便是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加入自己对教学的特殊理解。

在教学中，王力对中国传统蒙学教育的继承与改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在讲授《孟子》中《孟子见梁惠王》时，区别于当时博白县其他老师的带读背诵不求甚解的教法，王力的教法就非常不一样，他遵循了从特殊到一般的认知方法，先是带读一遍，教学生认字，接着就逐句翻译，再用白话文进行串讲，力求使学生理解文中的深意，听得懂也记得牢。如此，王力采用中国传统书院讲学的教学方式，在教学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其二，受聘于其他教育机构或学校。王力的教学成果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认同，使其声名远扬。借此机缘，县里名士李荫田聘请他到大车坪担任两年的私塾教师。这两年，他在教学方面的最大成就莫过于对教材的改进，以区别于历代教材在蒙学方面的传统性，如援引《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四书”等。为了丰富教材的内容，他又增选了一些古代的范文和经典诗词，如增选了《礼记》的一些章节，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凌霄花》，这使得他的教学方式具有灵活性，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

过了几年，王力受聘于李氏开国学校担任小学语文教师。在这所采用新学制的完全小学，王力的资历和学历虽然是最低的，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教学上的优异表现。他在教授高小语文时有几个显著的优点：第一，重视给学生传授语文基础知识，他善于将读、讲、写、背结合起来，务必使学生对课文理解透彻，背诵如流，以达到使学生熟练掌握词汇的初级教学目标，最终学会写作文的基本方法。第二，不拘泥于现有教材，自选自编符合自己教学习惯的教材。例如，他在给学生讲课文时，为了使学生掌握古文的语言规律和特点，特意以他家的《虚字使用法》为蓝本编写了讲义。又如，为了克服学生怕写作文的心理，他特意结合自己写文章的体会，选择王安石《论孟尝君》一文，给学生作论文示范。第三，扩大教师知识面，不拘泥于所教学科。众所周知，在教学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遇到许多跨学科的难题，王力克服这些难题的办法便是努力增加自己对所跨学科知识的理解。例如，他在讲《晏子》中“楚王欲辱晏子，指盗者为齐人”时，就把齐楚两国的历史、地理和课文中提到的橘、枳的有关知识讲得十分透彻。

（二）王力对中国自学传统的践行

拥有十年自学经历的王力对中国的自学传统拥有深刻的理解，“自学成才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科举时代没有大学上，所以成才的人都没有经过大学。他们就是从小老师教他们识字，以后呢？就靠自己成才。这方面的例子不少，古今中外，很多学者都是自学成才的”^[1]。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力对自学传统的认识与赞同。那么，王力是怎样践行中国的自学传统的？他长时间坚持这种传统的原因何在？

1914—1924年，是王力人生历程中失学的十年，也是王力自学的十年。王力自学的途

径主要有三个：一是修身自律，仔细研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这些文化典籍除了王力的祖辈留下来的，还包括王力在大车坪教私塾时意外获得的14箱书。据王力回忆，这14箱书使他的人生发生了第一个转折。这些书涵盖的范围很广，经史子集都有，天文、地理、医卜、星相并陈，更重要的是这些书的主人李月庄是清朝贡生，曾经受业于广东著名的“广雅书院”的山长。李月庄在“广雅书院”的读书笔记为王力效仿古人做学问提供了一个范例。二是教学相长，互相进步。在十年时间里，王力当了七年的教师，王力在这七年积累丰富教学经验的同时，也遇到了许许多多的教学难题。正是这些教学难题促使王力认真研读、思索，从而深化了他对国学的理解。三是积极与学界同仁交流心得。古人做学问并不只讲究研修自律，还得切磋学问，讲究互学互教。十年间，王力不仅积极参加对联比赛，广交诗友，还办起了“民十社”。

王力之所以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的自教自学，首先是因为家庭环境的熏陶，王力自幼接受祖辈们的启蒙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进一步养成了勤学好思的良好习惯，培养了极强的自律意识。其次便是我国本身已有良好的自学传统，中国传统教育不仅讲究老师的权威解析、师道尊严，还讲究学生的悟性。最后，国学文化的繁复性要求学生在学习老师所传授知识的同时，还得花一定时间去巩固已获得的知识。

（三）王力从中国传统教育中所获得的成就

说到王力与中国传统教育的关系，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王力先生不仅是中国传统教育的被教育者，更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传播者。在中国传统教育的润泽下，王力在国学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在诗词方面，王力完成了他的处女诗作七绝《中秋步月》：“金饼蹲鸱懒入唇，徘徊月下翠眉颦。香闺寂寞难归寝，恨煞天涯薄幸人。”^[2]该诗描写了中秋月夜时分少妇的孤独与凄苦，表达了少妇对负心郎君强烈的怨恨之情。另外一首《十月刈禾》：“大田禾熟正初冬，万顷黄云垄上封。尽日挥镰勤刈获，归来樽酒醉山农。”^[3]以质朴的语言表现了岐山坡庄稼丰收的情景，赞扬了农民的辛勤劳动，表达了对淳朴自然乡村生活的向往之情。这两首诗既有情又有景，相互衬托，写得平易自然，颇有韵味。

在诸子学方面，最有名的要数王力于1928年写成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老子研究》。在这本书中，王力着重剖析与阐释《老子》的基本内涵。全书共分为七章：第一章总论，主要是作者对《老子研究》一书当中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思路的概述与交代。第二章至第六章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主要从“道”的开始、道的深刻含义、道的存在方式、道的运用与道的效力五个方面论述老子的核心思想——道。第七章结论，是作者对《老子研究》一书的总结与思考。在这章当中，作者不仅对比概说了各家对《老子》的研究心得，还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老子研究》作为王力在广采古人（如董仲舒、王弼）和近人（如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的基础上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各家对老子的某些曲解，做到真正从文章的本意还原文章的深意。也正因为如此，虽然该书出版了多年，但王力对《老子》的研究仍能得到各大家的赞许与关注。这本书既是王力对诸子学勤学好思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教育对王力深刻影响的结果。我们有理由相信，若王力能在诸子学方面坚持研究下去，他所取得的成果将会是巨大的。

二、荏苒而又充实的清华光阴

如上所述，王力在国学方面已经有一定的造诣，但综观其学术道路，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在语言学方面。这个巨大转变还得追溯到1926年夏天，王力决定报考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生的那一刻。

（一）充满魅力的清华国学研究院

1925年，清华学校研究院成立，研究院是与原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并列的三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但由于研究院在成立之时经费有限，研究院只能先设立国学一门，续设自然、社会各科。在清华研究院短暂的四年光阴中，国学始终是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科目，故世人按其所教内容习称其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清华国学研究院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它开启了中国研究国学的一代风气，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是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一朵充满魅力的奇葩。

1. 清华国学研究院创办之缘起

关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创办的原因，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重要创办人的吴宓在研究院开学日的演说词《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与经过》中，传达校长曹云祥的意见时说：

曹校长之意，约为三层：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西方文化，亦有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哲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于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之有根底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此即本校设立国学研究院之初意。^[4]

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清华开办研究院的根本意图是“研究高深学问，造成熟稔国学适宜国情之专门人才”。其实，清华之所以这么迫切地摆脱自己过于西化的特征，还原自己的中国本色，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

首先，得从清华学校本身的性质来说。清华学校建立于1908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利用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建了以专门培养合格的赴美留学生为主要目标的游美学务处。毋庸置疑，清华的这种初衷将不可避免地使早期的清华带上了美国色彩。比如，在课程方面，分为中学和西学两部分，西学部课程主要为社会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一律使用英文教材，用英语授课；中学部课程，包括国文、中国历史、地理、博物等学科，使用中文授课。虽然清华学生中西兼修，但由于清华特殊的培养方针，西学课程明显重于中学，中学处在从属于西学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清华也曾被时人戏称为“在美国的美国学校”。

其次，整理国故运动促进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设立。1840年，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也是中国人开始从天朝迷梦中惊醒、向西方学习的开始。纵观中国近代史，我们不难发现，随着一系列侵华战争的开始，中国人对自己本身的制度与文化的自信一点点被消磨、吞噬，对西方的文化却越来越向往。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极端仇视，可谓这种心理的真实写照。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新文化运动遭到以胡适为代表的、深受中西两种文化浸染的知识分子的质疑与反思。于是，一场寻找传统与西化之间平衡点的运动开始了，这便是历史上有名

的整理国故运动。与此不谋而合的是，整理国故运动的思想宗旨正好与清华改组派“去清华的美国化，还清华中华本色”的目标一拍即合。因此，整理国故运动也就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设立进行了充分的舆论宣传，从而促进了它的设立。

最后，当时国内掀起了“振兴国内高等教育”的浪潮，清华紧跟浪潮准备筹备改办大学，以提升自己的办学质量，赢得声誉。招收本科生以及研究生均是其准备办大学的重要内容。而办好清华国学研究院，进而实现学术独立，是它成功改办的重要步骤。

2.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办学特色

清华国学研究院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为以后的中国培养了70多名诸如刘盼遂、吴其昌、徐中舒、陆侃如、马国端、姜亮夫等知名学者，这与其强大的导师团队、中西结合的教学方法、别具一格的教学制度等密切相关。

(1) 强大的导师团队。

我们在评价一个教育机构好坏的时候，往往会提及这个机构的教学设备和师资队伍建设。清华国学研究院在教学基础建设方面并不是最好的，这主要是由于它处于草创时期，经费有限。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师资队伍确实是当时国内最好的。吴宓在研究院章程的第四部分“教授与讲师”，提到出任研究院教授及讲师的任职资格：“一是，本院聘任宏博精深、学有专长之学者数人，为专任教授。常住院，任教授指导之事。二是，对于某种学科素质素有研究之学者，得由本院随时聘为特别讲师。”^[5]

吴宓循此思路，广收贤才，最终觅得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导师，他们都是学贯中西并热忱于本国传统文化的国学大师。在研究院的几年里，他们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带领学生采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教学相长，在教学收获颇丰的同时，也培养出众多优秀的国学人才。

王国维（1877—1927年），著名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早年留学日本，通晓日本、英国和德国文字，在经学、小学、上古史等方面均有较为精深的研究。

梁启超（1873—1929年），近代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幼年深受国学熏陶，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先驱。在诸子学、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佛教史、中国文学等方面颇有研究。

陈寅恪（1890—1969年），著名史学家、教育家，自幼受家庭的熏陶，酷爱经史典籍。1909年毕业以后，转赴欧美留学，先后就读于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校。在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的关系、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文、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比较，以及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等方面均有建树。

赵元任（1892—1982年），语言学的奠基人，也是著名的音乐先驱。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音韵学、现代方言学、普通语言学。

(2) 中西结合，融会贯通。

清华国学研究院虽然是在整理国故运动推动下的产物，被冠以“国学”之名，但是研究院对国学与西学却有着十分理性的思考，并不会因为国学的现状而否定西学，而是中西结合，融会贯通。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研究院的宗旨是“研究高深的学术，造就专门人才”。具体来说，其宗旨有以下几点：第一，谋求中国学科的独立；第二，重铸属于中国自己的国魂；第三，借鉴西方科学研究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第四，以中国文化整体的“国学”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第五，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学者和不同学校

的国学教师。严格来说,研究院所谓的中西融合便是在大的社会背景下,利用西方先进的研究方法研究国学,以达到中国学术的独立,重铸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其次,是各位导师的学术背景。四大导师生活在新旧文化激烈交锋的年代,是传统与变革在现实生活中的缩影,中化与西化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虽然他们都被称为国学大师,但学贯中西是他们身上固有的特征。

(3) 制度上的创新。

研究院之新,不仅表现为内容上创新,而且表现为对制度的创新。“略仿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和英国的大学制度,在研究方法上,注重个人的自学修为,由教授专任指导。”^[6]在开学之日,便将各位导师指导的学科范围和主要专长予以公布,使学生能够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学者的专长与学者自由交谈,从而大致确定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在操作上,稍微仿照美国的道尔顿制,在研究院内设研究室,丰富藏书,方便学生借阅,还请教授来进行指导,为学生释疑解惑。

这样,清华国学研究院不仅吸收了西方的导师制、学生住宿制度、道尔顿制的精华,还继承了中国传统书院制度,融洽了师生关系。

(二) 师恩难忘

1926年,仰慕清华大师才华的王力,通过了“一次特别的考试”(注:考试题目为答出一百个古人名,一百个古地名,一百部书名,一百句诗词),成功地以第二十六的排名考上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师从四大导师的清华岁月。

1. 记忆里的王国维与梁启超

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听的第一堂课是王国维讲的《诗经》。对于王国维,王力并不陌生,早年他就拜读过这位老师的著作,特别是对王国维写的《人间词话》推崇备至,也曾认为能写出《人间词话》这样有意境的诗词的作者,一定是风度翩翩的儒生,但不曾想他是一个头戴瓜皮帽,背后留辫子的小老头。当然,王国维在王力心中的形象并不与其外表成正比,相反,王国维讲课的朴实,对某些问题的独到见解,对自己所研究问题的逻辑思考,都让王力佩服不已。让王力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我不懂”,王国维在遇到许多问题时,常常不会轻易地下结论,总是以几句“我不懂”带过去,这并不是说王国维真的不懂,而是体现了王国维在学术方面求真务实的态度以及其在治学方法上的严谨性。老师的谦虚态度深深影响了王力,可以说王力对学术的认真和严谨与王国维有莫大的关系。1927年,王力准备毕业之时,却传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湖畔的消息。痛苦之余,王力为这位恩师写下一副挽诗《哭静安师》,以纪念他们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与王国维的为师之道。挽联写道:“似此良师何处寻?山颓梁坏恨悠悠。一自童时哭王父,十年忍泪为公留。”^[7]深深地表达了王力失去王师的悲痛之情。

相对于王国维在研究方法与精神上对王力的影响,梁启超对王力的指导与教诲就显得很广泛,如政见、历史观、诗词文章等。这主要是因为与王国维的“政治保守”相区别,梁启超认为“古必胜于今”,提倡改革与创新,在政治方面属于真正的改新派。梁每次在给王力讲中国通史时,都会表现出他对历史的独特理解以及他忧国忧民的情怀,这种教育对于像王力一样的中国新生代而言无疑是一种激励。当然,作为中国新一代文人,王力对政治并不是那么感兴趣,他尤其钟爱的是诗词文学。而梁在诗词文章方面的造诣颇深,尤

其是他的政论文,更有“惊心动魄,一字千金”“震惊一世,鼓动群伦”的美誉。王力钦佩老师的学问,也经常到老师家中请教诗词方面的难题,以至于事隔多年,当年梁启超给王力的那副“人在画桥西,冷香飞上诗句;酒醒明月下,梦魂欲渡苍茫”的集联,仍被王力视为珍品,妥善保存,足可见他与梁启超之间的师生情谊。

2. 怀念赵元任先生

在清华的四大导师当中,要数赵元任对王力的影响最大,这可能是由于在清华的第二届学生当中,只有王力一个人跟随赵元任学习语言学,王力算是赵元任的嫡传弟子,所以王力与赵元任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主要体现在几件看似平常的小事上。

第一,学术指导。1927年,王力即将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写了《中国古文法》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梁启超看了王力的论文很是欣赏,给了王力“精思妙语,可为斯学辟一新途径”的评语,还写了“卓识”“开拓千古,推到一时”的眉批。而作为直接导师的赵元任却刚好相反,专挑王力的毛病,王力在文中讲到“反照句”“纲目句”的时候,加上了一个附言说:“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罕见。”实属有些草率。赵元任批云:“删附言!未熟通某文,断无可定其无文法。言有易,言无难。”^[8]但王力在另一篇文章《两粤音说》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以两粤作为一个整体,又以自己家乡话里没有撮口呼而草率地说两粤没有撮口呼。1928年,赵元任去广州调查方言时发现了这个错误,还特意写信给在巴黎的王力,王力由衷地钦佩赵元任先生的这种对学术的执着与谨慎。当年,老师给他的那句“说有易,说无难”也就一直成为他的座右铭。

第二,给出留学建议。清华毕业前夕,他特意拜访了恩师赵元任夫妇,向老师请教自己未来的出路问题。赵元任回答说:“依我之见,你最好到巴黎去留学,在那里你将学得许多语言学方面的东西。”^[9]王力最终听从了老师的建议,踏上了去巴黎留学的道路。

第三,赠书。巴黎留学之后,赵元任与王力便很少见面了,但先生始终没有忘记王力。1928年,赵元任将他的新著《现代吴语研究》寄给仍在巴黎的王力。1939年6月14日,他又从檀香山寄给王力一本法文书《时间与动词》。1975年,他从美国加州寄给王力一本用英文写成的《早年自传》。这三本书不仅见证了赵元任先生对语言学的严谨,更见证了王力与其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

第四,悼念赵元任先生。1982年,本来打算回国长期定居的赵元任先生,不料与世长辞。王力听闻噩耗,悲恸不已,并于1982年4月2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怀念赵元任先生》一文来表示他的悼念之情。文中最后王力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了挽诗:

离朱子野逊聪明,旷世奇才绝代英。
提要钩玄探古韵,鼓琴吹笛谱新声。
剧怜山水千重隔,不厌樵轩万里行。
今后更无青鸟使,望洋遥奠倍伤情!

三、清华国学研究院对王力的影响

在清华学习的一年,对王力的人生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他曾经说:“如果说发现14箱书,是我治学的转折点,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学问,那么,研究院的一年,就是我的

第二个转折点，有了名师的指点，我懂得了到底应该怎么做学问。”^[10]将自己在研究院一年的生活作为自己人生的转折点，可见清华国学研究院对王力的深刻影响。

（一）在清华国学研究院里的成就

研究院不仅使王力获得了真挚的师生情谊，懂得了治学的一般方法，还改变了王力的研究方向：从诸子学转向语言学。这种转折主要体现在他于清华研究院读书时所写作的论文上，如《三百年前河南宁陵方音考》《中国古文法》等。

1. 地方方音考

王力在清华读书期间，在方音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一篇论文上。《三百年前河南宁陵方音考》是王力于1927年发表于《国学论丛》1卷2期的作品。在这篇文章中，王力在文章开头介绍了自己用明代吕得胜和他儿子吕坤所写的《小儿语》和《续小儿语》作为自己研究宁陵方音主要材料的可行性。他认为：书的作者都是河南宁陵人氏，书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会符合河南宁陵口音，又因为书的读者是小儿，“必定音韵和谐，从此考求，不会错的”^[11]；再者，考求古代口音，高雅的诗歌是靠不住的，因为写诗一定得押入庚润，这便叫笔不对口，没有太多口语色彩。最后，因为明朝离现在不远，我们可以用现在所有的口音，比拟他们的口音，做一个假设研究，从而使得研究具有可靠性。在文章的论述过程中，他将宁陵的口语归结于以下几个方面：①东冬韵字都混入庚青燕；②先韵字都混入寒删韵；③阳韵混入唐韵；④齐韵混入支韵；⑤萧肴韵混入豪韵；⑥真元韵通；⑦浊音上声变去声；⑧入声便平声；⑨只字读音。这篇文章体现了王力对河南宁陵方言的一定认识。

2. 文法研究

《中国古文法》是王力于1927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完成的毕业论文，他的“这篇《中国古文法》本想写成一本书，但是时间不够，只写两章就算毕业了，毕业后，马上准备去法国留学了，所以这本书没有续写下去”^[12]。

这本书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言：文法学概论”，讲述王力对文法学的一些认识。其一，何为文法学？文法学就是深刻探究并找寻出文字组织法则的科学，从而使得写作文的人在行文时有写作的凭据，最终使得阅读者通晓作者文中的深意。其二，文法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会随着语法的改变而改变。其三，中国文法的二特性：①中国古文法的固定与不固定；②“中国有影响变性之文法”。

第二部分为“已固定之文法”，主要论述中国已经有的固定文法，王力在这部分的第一章对自己这本书的内容做了概说。本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古文法与今文法在内容上的主要区别。他说：“古文法者，数千年沿用之文法也；今文法者，今人以语体为文之文法也；不直称之曰语体文法者，以别于古之语体文也。”^[13]第二，字与词关系。第三，词关系与意关系。第四，语句构造概说。第五，格。格有四种：主、宾、副、领。领格又有所有格、范围格、势力格。第六，句之种类。在第二章，王力按照总略的写作思路，对词的分类进行了展开论述。在词的总说上将其分为五类：称谓词，动作词，限制词，关系词，语气词，并对这些词进行列表分析，然后逐一对这些词进行分析并举例说明。

从这本书中,有两点我们是不难发现的,王力对语言学中的文法学有着自己的理解,这是其一;其二,王力对中国古代的作品很熟悉而且精通,这主要表现为:他为说明问题所使用的引言种类丰富且到位。

(二) 毕生追求的事业——语言学

王力在小学教书的时候就对语言学感兴趣了,读大学的时候,他本想对这个方面进行深刻的研究,也曾认真地对《马氏文通》进行研究,但他还不知道自己是继续搞文学创作,还是进行语言学研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那一年,他最终确立将语言学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

1. 人生的转折——清华国学研究院

王力是怎样走上语言学道路的,他为什么能够将语言学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早在王力当小学老师的时候,他就对他父亲书架上的《虚字使用法》很感兴趣,他也曾将其拿来改编过,加上自己的意思,教给学生,“这可以说是我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开始”^[14]。第二,24岁以前的语文学习,让王力有了扎实的语文功底,为语言学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第三,名师的指点,“但我真正走上语言学的道路,则是受了赵元任先生的影响……赵元任先生给我们讲《中国音韵学》,我深感兴趣。这个兴趣比看了周善培《虚字使用法》所感的兴趣大多了”^[15]。第四,对科学的热爱,相对于他人对语言学枯燥无味的感觉,王力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着自己的理解,对自己所要承担的任务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科学,它把语言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是语言学并不等于语音。语言学家是要学习多种语言的,但他们学习本国语言和外语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对语言学现象进行科学的研究,取得科研成果。更准确地说,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本质、结构和发展规律的科学。”^[16]他不认为语言学是枯燥无味的:“如果拿文学来比较,语言学确实是枯燥无味了。但是,语言是科学,文学是艺术,是不好拿来比较的,我爱好文学艺术,但我更爱科学,这就是说我为什么从文学转到语言学的道路上来。”^[17]

2. 为语言学奉献的一生

1927年,王力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以后,即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语言学。留法期间,王力在巴黎大学学习实验语音学。同时师承法国著名语言学大师房特里耶斯特教授学习普通语言学,不仅系统地学习西方语言学理论,还广泛地接触了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1931年,王力完成了自己1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博白方音实验论》。1932年,获得博士学位以后,王力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专门讲授中国音韵学和普通语言学,并在燕京大学兼职讲授中国音韵学。1936年,王力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中国音韵学》出版,同年还出版了《江浙人学习国语法》,并在《中国文法欧化的可能性》和《文字改革的理论与实际》这两篇论文当中初步论述了他对语言改革方面的设想。抗日战争期间,王力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语法》《中国文法学初探》《文字改革》《中国语法理论》等多部著作。新中国成立后,王力先后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语言学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等职务，并写成《字的形音义》《汉语史稿》《谈谈汉语的规范化》《汉族的共同语和标准音》等多部专著，主持编订了《汉语拼音方案》，以及对《古代汉语》等教材进行整理，发表了诸如《虚词的用法》《语法的民族特点与时代特点》《中国语言学的现况及存在的问题》《汉语拼音改革方案的优点》《中国语言学的继承与发展》等论文。清华国学研究院为王力走上语言学道路创造了一个起点，自那以后，语言学便成了王力毕生追求的事业，王力本人也通过自身的努力为祖国的语言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结语

贯穿全文，我们始终在讨论一个中心问题：传统与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国人对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态度。20世纪初，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进中国时，国人就开始面对这种被迫的选择，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维新派的君主立宪到革命派的民主共和，我们一直号召向西方学习，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但西方文化与制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我们意识到西方文化的某些缺陷。于是，人们又开始反思自己所走过的一些历程，开始了从传统中找寻一些可以拯救我们在“西化”过程中所犯的一些错误的方法。

第二，教育界对教育改革“西化”与中国传统的反应。教育改革是对教育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修正与完善，因而不可避免地需要对教育制度作出很大的调整，如改变教育宗旨。中国古代教育最大的目的就是为封建统治者培养为其效力的封建人才。在封建制度被推翻的情况下，为国家富强培养适用新时期建设的人才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而在向西方学习如何进行教育改革的同时，我们仍不应该忘记那些优秀的教育传统。讲究师承，融洽师生关系，注重个性化培养，对现在仍然有借鉴意义。我们需要做的还是像清华国学研究院那样，立足本土，放眼世界。

第三，大背景下的教育改革与个人成长成才之间的关系。教育虽然不是个人成长成才的决定因素，但教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能决定个人的人生走向。王力先生接受的传统教育使他拥有扎实的国学基础，上海国民大学的学习使他开始较大程度地接受西化教育。而清华国学研究院一年的学习生活成为他个人人生的第二个转折，在这里，他完成了自己的学术转向，从事语言学研究，并将此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最终成为著名的语言学家。

注 释

[1][9]张谷,王缉国.王力传[M].南宁:南宁教育出版社,1984:10,84-85.

[2][3][7]王力.龙虫并雕斋诗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1-2,3-4,5-12.

[4]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J].清华周刊,1925(2):71-72.

[5][6]吴宓.清华大学研究院章程[J].清华周刊,1931(11-12):21-47.

[8][12][13]王力.王力文集三卷[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84-85,3-4,

5-12.

[10]张谷,王缉国.王力师从四大教授[J].教育旬刊,2009:46-47.

[11]王力.三百年前河南宁陵方音考[J].国学论丛,1927(2):287-297.

[14][15][16][17]王力.我是怎样走上语言学的道路的[J].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1982(8):94-95.